

再论中国和西方的“内卷”相对“发展”

黄宗智

“人多地少”可以说乃是中国明清以来的最基本国情。对农民来说，伴随人口的增长和劳均耕地面积的压缩，迟早必定会导致边际劳动投入产出的递减。前现代的“精耕细作”演变固然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既提高单位土地产出，也提高单位劳动投入的产出，但迟早不可避免地进入单位土地和单位劳动产出的递减，亦即笔者所谓的“内卷”。

固然，土地之外的前现代“资本”投入，譬如，技术方面的提高、从旱稻到水稻的转变、或更多更优质有效的肥料投入，一定程度上能够扭转劳均产出递减的“内卷”困境，甚至导致一段时期的显著提高，但在之后日益攀升的人口压力以及单位土地的劳动与资本的投入长时段递增的趋势下，边际劳动和资本投入迟早必将面临边际效应递减的“内卷”状态。

“内卷”一词是笔者多年来最常用的一个概念——在西方的农耕史中相对罕见——其要表达的便是中国在上述的长时段的、在人多地少压力下近乎不可避免的趋势。越来越密集的亩均劳动和资本投入，迟早必定会面临边际报酬递减的“内卷”实际。而且，正因为那样的“前现代”农业产出已经达到相对较高的境界，其后来转入现代农业所带来的产量扩大也将会相对较小，也更加困难。笔者将上述的中国基本实际称作“内卷”，并将其视作中国相比西方的最突出和基本的不同国情之一。在西方前现代历史中，“内卷”现象相对少见，该词也相对罕见；在中国则是基本实际。中西方的差别，究其根本，乃是“前现代”中国相比西方比较突出的相对“人多地少”及其农业在现代化之前的长时段“内卷化”的基本国情。

与“内卷”对立的概括首先是“革命”——即通过技术或（资本）投入的革命性更改而得出的生产上的突破性提高。前现代中国的一个例子是农耕技术的提高，譬如，从旱稻转入水稻，或器具改良，如转用铁制农具。更突出的当然是，转入现代化肥以及/或机械（尤其是拖拉机）的投入而做到的劳均和/或亩均产出的显著提高。但其前长时段的基本实际则是，在内卷化的传统中国农业中，单位土地的劳动与肥料投入都要远比传统西方密集得多，单位土地产量也远高于西方。

正因为如此，其从前现代农业转入现代机械化和化肥革命所获得的产量增长也比西方相应较低，其过程也比西方艰难。也就是说，正因为中国的传统农业单位土地产出已经由于“内卷”而相对较高，其转入现代农业发展的过程实际上要比西方艰巨。前现代中西方在这方面的差别特别显著。

除了“现代化”与“革命”的概括之外，与内卷相对的是“发展”——即单位劳动或土地报酬递增的发展。在中国，最好的前现代实例也许是，上述的从旱稻到水稻的演变，或转入铁制农耕器具使用的演变。带来的是，相应劳动投入扩大的同等产出的较罕见的非“内卷型”上升。但前现代中国农业长期以来的主要演变模式是“内卷”而非“发展”。

在西方，上述的“内卷”现象则相对罕见，“内卷”involution一词也因此极少被使用。在西方，关于农业的用词，主要就是“前现代”相对“现代”的二元划分，在中国则须在“前现代”之上，加用西方基本不见的“内卷”用词。在西方的农业史论述中，我们基本只见“前现代”与“现代”（即纳入了机械和化肥投入）的两个相对用词。而在中国的农业历史中，则须要在“前现代”和“现代”二者之上，添加“内卷”的第三元表达。这是中西方农史间的一个根本性不同。其背后的主要差别毋庸是较悬殊的人均耕地面积。

这也是笔者长期以来一直特别突出“内卷”概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的原因。仅凭西方惯用的“前现代”和“现代”的二元划分来认识中国，可以说等于是完全忽视中国相比西方最突出的高密度人口基本实际，甚至乃是前将中国历史硬塞进西方的框架中来理解，忽视中西方的实际中关键的不同。

此点不仅关乎中西方的“前现代”历史，更是关乎两者“现代”历史的不同。西方的历史确实不需要将“人多地少”认作其历史的根本型特征，可以不考虑人口因素的特点来将前现代和现代相比和对立。但中国则不能。无视前现代中国人口规模和其相对稀缺土地资源的特点，乃是对中国历史根本性特点的无视，实际上等于是将中国历史硬塞进西方历史的框架。无视中国前现代已经看到的“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等于是将中西方简单地等同起来，有意无意地将西方的基本历史框架来强加于中国，无视中国与西方根本性的不同——即，前现代西方（相比中国）的相对“地多人少”和中国相比西方的相反“人多地少”基本国情。

直面此点，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到两者间的诸多其他共同。采纳简单的“前现代”和“现代”二元对立来同样地认识中西方，忽视前现代中国的人多地少基本国情，乃是一种脱离基本实际的粗略历史观，等于是忽视前现代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也是一种西方中心化的历史观。将中国历史塞进源自西方的简单“前现代”和“现代”二元划分，或从“封建”到“现代”的二元化分，都是无视中西方人地比例悬殊的基本实际的错误单一化历史观。我们必须正视两者间的这方面的根本不同，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到它们间的其它共同。

强将两者塞进任何一种单元化的历史观——譬如前现代相对现代的划分，或马克思一度采纳的西方的前现代封建和现代资本主义，相对中国的前现代“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的划分，都是比较勉强的。我们需要既看到前现代中西方间的不同，也要看到它们的共同，更要看到它们之间的现代的共同。兼顾中西方前现代的基本差异和其现代的一些基本共同，我们才能真正掌握西中间的既是不同也连带有一定共同的实际。此点不仅关乎我们对“前现代”中西方的异同的认识，更关乎我们对“现代”中西方的异同的认识。简单将二者对立，或简单将二者等同，都是不可掌握实际全面的进路。我们需要的是，既掌握其间的差异，也看到两者在近现代逐步趋同的新趋势——即非农工业的发展、现代工业化农业的来临、以及农业人口相对全人口递减的共同的现代化发展趋势。